

Mc
Graw
Hill Education

批评与 文化理论中的 关键问题

**Key Issues in Critical &
Cultural Theory**

[英] 凯特·麦高恩 (Kate McGowan) 著 赵秀福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批评与 文化理论中的 关键问题

**Key Issues in Critical &
Cultural Theory**

〔英〕凯特·麦高恩 (Kate McGowan) 著 赵秀福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 - 2009 - 467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批评与文化理论中的关键问题/(英)麦高恩(McGowan, K.)著;赵秀福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3
(文艺思潮与文化研究系列)
ISBN 978 - 7 - 301 - 20111 - 4

I. ①批… II. ①麦… ②赵… III. ①文化理论 - 理论研究 IV. ①G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10912号

Kate McGowan
Key Issues in Critical & Cultural Theory
ISBN 9780335218035

Copyright © 2007 by Kate McGowan.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photocopying, recording, taping, or any database, information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This authoriz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is jointly published by McGraw-Hill Education (Asia) and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o SAR and Taiwan.

Copyright © 2012 by McGraw-Hill Education (Asia), a division of the Singapore Branch of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and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版权所有。未经出版人事先书面许可,对本出版物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或途径复制或传播,包括但不限于复印、录制、录音,或通过任何数据库、信息或可检索的系统。本授权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麦格劳-希尔(亚洲)教育出版公司和北京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合作出版。此版本经授权仅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销售。

版权©2012由麦格劳-希尔(亚洲)教育出版公司与北京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所有。

本书封面贴有 McGraw-Hill 公司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书 名:批评与文化理论中的关键问题

著作责任者:[英]凯特·麦高恩 著 赵秀福 译

责任编辑:吴 敏

标准书号:ISBN 978 - 7 - 301 - 20111 - 4/G · 3305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5217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pkuphilo@163.com

印刷者:三河市博文印刷厂

经销者:新华书店

965毫米×1300毫米 16开本 12印张 173千字

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24.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致 谢

本书之完成,得益于许多人此前完成的著作和提出的观点,要指明我获益的地方,总不免有挂一漏万的遗憾,但我应当感谢玛格丽特·比瑟姆、露西·伯克、西蒙·马尔帕斯、亚瑟·麦高恩、沙夫恰特·纳瑟、杰奎琳·罗伊、博索霍德·舍尼,因为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密切关注着如何透彻地思考事物这一过程。另外,我还要向我在曼彻斯特城市大学往届和现在的学生表示真挚的感激之情,是他们以某种方式提炼出了研究批评理论中的“问题”这一概念所涉及的诸多术语。他们对各种观念表现出了难以餍足的浓厚兴趣,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往往出人意料,甚至有些咄咄逼人、不留情面,但在我这都是弥足珍贵的经验。但按照惯例,我还是应当指出,本书中若出现任何错误,都与前面提到的这些人没有任何关系。

我还应当感谢出版商和编辑们的耐心,感谢克里斯·卡达莫的热情和支持,也感谢本书的审读者,他们的建议在本书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积极有益的作用。

最后,我要向沙夫恰特·纳瑟表示特别的感谢,他对我个人在写作上表现出来的恐惧和不安表示了足够的宽容和理解;我还要感谢我的父亲,他竟肯于去认真思考何以文化中被视为当然的事物往往悖理荒谬,让我至今感念不已。

目 录

致谢 1

导论 1

第1章 文本性与意义表达 11

第2章 美学 33

第3章 伦理学 64

第4章 他者性 96

第5章 真实 124

第6章 非人性 146

结论 174

术语汇编 176

参考文献 180

译后记 185

导 论

一男子用电子内裤“假冒心脏病发作”

www.guardian.co.uk

1999年10月,一名男子据说用家用电熨斗给自己实施电击,然后用一种“藏在便裤中的高级移动电话服务(amps-in-his-pants)”装置,试图骗过医院的心脏病监测器,让它证明他患了心脏病,并且他的心脏因此而跳动异常。他的计谋被医务人员识破,并于2005年7月4日被送上法庭。此事首次被《卫报》网站报道,时间为2005年7月5日早晨,题目如前所引;然后,当天稍后又上了《卫报》报纸,题目变为《一男子用电子内裤“伪造心脏病发作”》。该男子这番苦肉计的目的在于起诉该产品的制造商,要求300,000英镑的赔偿。(《卫报》2005: 6)

我觉得这个故事有趣,部分的原因是它有着华纳兄弟公司电影的悬念,那就是大笨狼威尔·E. 科约特(While E. Coyote)无论如何费尽心机,却总是功亏一篑,难以如愿。另外一个原因则是,该故事从多个层面折射着人们的文化意识,不仅仅是21世纪才有的稀奇事儿。它讲述的既是一个“小人物”如何算计处于强势地位的公司的故事,同时也是一个关于他者之不幸的确定性的故事,显示出人们对于陌生和奇异事物的渴望,而这也是对读者的“正常性”的一种印证。另外,到底如何区分文化所执着追求的、它所认定的“真实”或“正宗”,和以“非真实”的形式所显示的“真实”之间的关系,在任何一种文化中都诚非易事,这个故事就是一个有趣的例证。假冒即是模拟,伪造则是照搬。模拟具有为取代某物而制造该物的效果,照搬则是非原创性的呈现。在从电子文本转移到印刷品的过程中,新闻的标题从“假冒”变为“伪造”,暗示出进一步的焦

虑。为平复这种焦虑,需要制造出一种具有更大潜力的**符号**,从而抑制第一种符号无意中产生的不确定性。如果该男子是伪造出了心脏病发作的症状,那么,他就并没有受到该病的困扰,他真实的血肉之躯也就没有受到损害。如果该男子是假冒的,那么,事情就变得更为扑朔迷离,尽管他仍然会康复。对于第一种描述,读者不得不多费一些心思。那个男子到底有没有心脏病发作?他的自残性的电击,是不是不如无意中的电击来得真实?那个“藏在便裤中的高级移动电话服务”装置果真伪造出了相应的症状,果真带来了心脏病发作所必需的条件,并引发了真正的心脏病吗?

到2005年7月7日,英国的报纸停止了所有与此相关的、看似轻浮的报道,转而关注后来被称之为“7·7”事件的、在伦敦地铁和一辆30号公交车上发生的爆炸案。数周之中,英国媒体的注意力一直被这样的故事所吸引:四名男子在背包中装满了炸药,在交通高峰时刻从伦敦不同的地铁站上车,乘坐拥挤的地铁和一辆公交车,然后引爆了炸药,杀死了自己和周围的人。当时似乎每一个人都想弄清楚的是,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即便是今天,这些问题依然挥之不去: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意味着什么?除了这一事件的极端恐怖性,媒体关注的是,为什么英国公众会做这样一件事情?而且,在事件发生之前,作为“我们”——据说,这种集体性的“我们”构成了英国文化和社会——中成员的这四名男子,平时如何能够做到中规中矩,而没有表现出任何可以察觉的异常迹象?这一天之后,随着各种印象、目击者的描述以及各种关于怀疑和未能正确“读解符号”的猜测的广泛传布,7月7日这一“事件”就作为各种描述的效果(effect)而被制造出来,而这些事后的追忆性描述,都试图解释这件在事发当时看来“没有来由的”事情。

当然,伦敦发生的事件所造成的后果,要比用电子内裤自虐的男子一事所造成的后果严重得多。然而,两者都显露出若干有关**表意(signification)**与解释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对所有文化批评实践都构成了特定的难题。这可能包括有关表象的问题——表象如何产生意义?即便有可能,如何可以说表象与所谓的真实发生联系?这还可能包括更为细致一些的美学问题——例如,意象与词汇,除了在读者或观者那里造成

特定的效果之外,与其他所有相关的、之前的描述形式,构成了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例如,为什么关于骇人听闻的事件的意象被一再地制造出来?在忧心忡忡地重复关于事件的描述(而这些描述替代了其所可能“表象”的事件)的过程之中,观者是否获得了某种洞察真相的能力?另外,某种骇人听闻的事情所带来的愉快——不论是意象本身带来的愉快,还是主张所带给观者的愉快——是一个充满争议性的领域,其中什么东西至少没有发生?这些问题似乎也引发了关于伦理学的进一步争论——某些描述文化事件的方式,某些以不依不饶的质问方式对那些广为人知的描述所进行的批判,是否合乎伦理。关于文化批评伦理学,其核心的争议是这样一种观念,即把真实看做是诚实性或可靠性的参照,依据这样的参照,在道德领域内,分析的相对化倾向被认为是行不通的。但这至少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即作为一个切实可行的分析概念,人的状况以及人在文化世界中的“位置”的问题。

伦敦爆炸案成为本世纪的文化文本之一,被解释和重新解释的可能性²,看起来似乎是无穷无尽的,人们也会从各种各样的角度出发,认为各自的描述是真实的。这一事件的意义,已经部分地极端依赖于它与另外一个事件的关系,后者与前者尽管有若干共同之处,却在意义的显豁上,无疑使得前者相形见绌。就伦敦爆炸案很快被贴上“7·7”事件这一标签所显示的,几乎是从一开始,要抛开2001年9月11日在纽约发生的世界贸易中心双塔被炸毁所建立起来的理解世界的框架来阅读这类事件,是不可能的。通过突出其文本性的和意识形态性的共同点,“7·7”和“9·11”显然互相指意(signify)对方,但这也因而掩盖了英国及其政治状况与美国及其经济之间所可能找出的差异。在这一点上,还算幸运的是,在伦敦地铁和公交车上使用炸药的人选择了在7月7日开始行动,因为“7·7”的对称性掩盖了英国人和美国人在使用格利高里历法表示时间时一种基本的、文字上的习惯性差异。英国人习惯于先写日期再写月份,美国人无论在书写还是理解上,都是月份在先日期在后。于是,“7·7”以某种方式掩盖了两种理解历史事件方式上的差异,而同时彰显了某种相似性。然而,这也同时凸出了一种模糊性,因为这可以说是既掩盖又突出了它所依赖的差异。

“7·7”以暗喻或转喻的方式**指意**(signify)的潜力,似乎也是无处不在,因而,与那些没有受到广泛关注但后果同样严重的事件相比,“7·7”就显得格外突出。就这一点而言,在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甚至在马德里的爆炸事件,很容易就被忽略,不被认为对热爱民主的人民构成所谓的“全球性”威胁。因而,“7·7”最终因其与某种相似事物的关系而被人理解,也因其与某种相似但相似程度不够的事物的被**否认**(disavowal)而被理解。在此意义上说,意义显而易见也是一个价值问题。然而,尽管与之前所发生事件的关联起了部分的作用,而这种方式带来了它追忆性的意义,但也掩盖了它在另外的意义链中的意义,而这又突出了另外一种价值:即美国的政治主导地位。事实上,2001年纽约所发生的事件已经主宰和决定了一种全球性想象(imaginary)的术语,而这是伦敦爆炸事件永远无法做到的。就此而言,“9·11”很可能已经成为今日文化中最为广泛传播的符号。

3 由于与“9·11”相关的意象铺天盖地而来,要想回避阅读这些意象是不可能的。从一名游客用摄像机拍摄下来的**奇异的**第二架飞机的镜头,到被重复播放的普通民众嚎叫着逃离浓烟滚滚现场的画面,“9·11”已经以极为独特的方式嵌入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记忆之中。然而,尽管这些意象是在跑动中拍摄下来的,没有任何准备,也在预料之外,但在其拍摄的瞬间,也被置入一种与之前意象的关联之中。对第二架飞机的拍摄之所以是奇异的,恰恰是因为它被放置在了一种直接来自于好莱坞的审美传统之中。关于逃生民众的那些画面,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其他意象的影响,特别是那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投向长崎平民的原子弹爆炸所引起的蘑菇云下面逃跑的小女孩这一经典的意象。尽管与“9·11”相关的意象因是瞬间完成而被当做是“可靠的”,它们仍然印证了人类的感知甚或经验所存在的、完全文化的构造性,而且,不论是人的感知还是经验,都受制于再现的形式,因而呈现出不同的层次。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即便是感知并没有意识到其自身,这类结构的力量也会持续存在,因为感知所揭示的是意义制造过程中意义表达的运演(play),而不是它似乎要印证的、所谓的经验的内在性(immanetism)。

通过突出任何意象运作都需要的结构上和意识形态上的依赖性,这些意象所指涉的某种非自然化就成为可能。就以围绕“9·11”而来的意象的充斥而言,这几乎成了一项紧迫的任务。事实上,对于这些看似自发的表征之**文本性**(textuality)的描述,其所能提供的,不过是对已经隐含于其中的另外一套意义的窥探,而我们就是凭借这些表征最终以为我们“了解”了“9·11”。当然,在一个回避这些照片所依赖的文化和政治差异的框架中来阅读这些照片,也是完全可能的。但同样可能的,就是拒绝这样做,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拒绝那些显然被轻易肯定的、通俗的价值观念。如此一来,这些意象传布过程中被视为当然的价值观念就会被瓦解,而且,美国在世界上的漠然行为,像其背负的过去的一个幽灵一样,可以说又将重新困扰它。这样一种观察方式的潜在意义,如随后的文化批评所擅长揭示的那样,是巨大而深远的。

且看有关 2001 年 9 月 11 日纽约市的这样一幅图像(图 I.1)。把这一图像看做是对某一真实时刻的逼真的捕捉,其价值是什么?一方面,这显然是刹那间对那一时刻的捕捉。另一方面,它又明白无误地经过“摆布(staged)”,从而证明着许多东西,远不像它自身那么简单。如果说它是某一真实时刻的捕捉,那么,它所捕捉的不仅仅是这一真实时刻的**真实**,而是它已经被建构起来的条件(condition)。尽管借助飞舞的碎片、罕有的滚滚浓烟,画面呈现了爆炸瞬间所造成的痛苦创伤,但画面受制于基督教信仰的符号——十字架,教堂所赖以建立的基石——所占据⁴的突出位置。毁灭所造成的灰烬,显然让位给了十字架这一符号。十字架占据核心位置,还产生了进一步的后果,即通过把这一符号转移到照相机的底片上,画面所刻画的隐喻意义受到限制。十字架暗示了事件所具有的另外一种意义,即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冲撞,而当今有关“恐怖”的种种讨论,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冲撞上。如将其从视域中取消,地缘政治和经济立刻就变得与世界贸易中心双塔的毁灭所能表示的意义没有关系了。然而,若放置进来,它们就表现出那种意义,而且,其表现方式将带来另外一套极为不同的、潜在的可能性。



图 I.1 纽约市,2001 年 9 月 11 日

资料来源:《时代》照片,詹姆斯·纳赫特威拍摄。

十字架这个符号还有助于解释整个画面。画面“之中”到底有什么东西使得它成为一个与某一个特定城市的特定日子相关的意象?这个画面可以是全世界任何一个城市被毁灭的意象。但它不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赋予这幅照片所可能具有的意义的,发生在画面之外,存在于另外一套关于两种信仰之“冲突”的自然化的符号里。因而,这幅照片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与画面之外的某种事物之间存在着一种关系,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事物却又在画面之中起作用。另外,照片显示出,在镜头聚焦于某一物品的一刹那,这一切竟然都在“发生着”。

尽管这种阅读这一符号的方式是可能的,显然这并不是—种无动于衷的阅读。这涉及对意义的思索、所指、审美和真实等问题。这种阅读也没有超出伦理学和人性的概念范围,尽管这些概念已经与其常识意义有了很大的不同。但是,是否存在着并不必然涉及这类判断的意象的阅读呢?无疑,依据意象的特点来阅读,也需要调动概念性的思维,尽管这种思维本身并不占据突出地位。

从看似极为平凡的、关于那个用电子内裤自虐的男子的报道,到出人意料

5 人意的、复杂的关于9月11日和7月7日一类事件的报道,意义表达、阅读和理解人类动物栖居的世界等问题,都看似极为显而易见。然而,意义表达、阅读和理解所依据的语汇,在充斥着周围的大众性表述中,却很少得到检讨。除了援引“真理”、“经验”、“显而易见”,或者更

糟——“常识”等陈词滥调之外,有关意义和解释的问题层出不穷。当然,事情并非总是如此糟糕。使用电子内裤的骗子的既得利益,从未远离理解这一行为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解码行为这一总体背景。同样,英国布莱尔当局、美国布什当局或德法的民主政体的利益,以及那些不同程度上反对他们的政体的利益,从实践上说,也从未远离相关部署所引发的言论和行为所发生的更大的场景。另外,由于阴谋叙事所在多有,那些利益就成为这些被认为是清晰的解释、意义和另外一套相同意见的驱动力。

从另一方面说,文化批评要求更为彻底地关注这类意义表达的机制、效果,对之进行阅读的实践,关注从中所产生意义的后果,或许重要的是,关注那些经过辩驳与质疑的意义。如果文化批评想要有所作为,而不仅仅是一种寄生式的重申文化之意义的手段,那么,它就必须既对它所运用的参考框架有清醒的认识,又能够描述其实践,而且,其描述方式能够经得起理智的检讨,并在此基础上,可以进行争论、辩驳,甚至可以重新安排。

把两个故事——一男子和他的内裤的故事,与 21 世纪两次恐怖行为的故事——并列在一起,立刻就会带来有关文化文本操作的一系列问题,而这是文化批评从一开始就必须面对的问题:文化批评“正当的”对象是什么?思考文化批评的对象,立刻就会带来很多问题,其中包括与价值相关的问题。例如,文化批评会倾力关注平常的、情色的、经典的、边缘的、大众的和/或精英的问题吗?文化批评家如何判定其对象的地位?平凡的不如引人注目的重要吗?经典的就比边缘的更值得分析还是相反?文化批评在完成其特定的理性目标时,应当容纳这些术语及其区分吗?简言之,你可能最终会问,文化批评在做什么,其目的是什么?

本书的论点是,文化批评提供了一种参与文化建设、关注文化中产生的意义的独特方式,而文化所产生的意义在当今世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世界以及与世界相联系的我们,之所以能够被界定,依赖于所创造出来的意义,如果对创造意义的东西缺乏了解,主要的文化意义就得不到彻底的、持久的检讨。因此,文化批评必须具有足够的准备,能够提 6

供的不仅仅是如其在文化中显示的那种层次上的异议。更确切点说,它必须首先审慎地关注意义之可能性构成本身——我们如何获得知识,如何解释并真正理解什么东西。如此一来,文化批评必须检讨的不仅仅是对于某一文化中或某一文化契机的不同文本的解释,而是思想本身与所谓文本、文化、契机的关系,甚或可以说,与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的整个形而上体系之间的关系得以显示的术语。这样说来,文化批评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对于“我们”重要。也就是说,它为我们提供了我们需要的参考框架,从而使得我们能够在当今世界直面和探索存在、思想、权衡和判断的意义。因而,在这一点上说,文化批评应当是无休止的、不讲情面的。

它应当涵盖那些日常的、平淡的和可笑的文本,也应当涵盖那些被公认更有深度、更为严肃或具有更大价值的文本。它应当关注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文化文本内部产生的意义,也应当关注与之相关的意义,而不论文本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它应当能够审慎地关注一个事件、一次活动、一种象征,也能同样审慎地关注伟大或通俗的小说作品、好莱坞爱情故事或先锋影片,甚至包括来自经典传统的音乐作品,哪怕它们像莫扎特的音乐与北极猴(the Arctic Monkeys)或凯莉·米洛(Kylie Minogue)的音乐那样差异极大。它应当能够分析文本所制造和传播的意义的细微具体之处。当然,它也应当能够应对那些必然会临时出现的有关作者—读者关系的种种问题。换言之,文化批评必然也能够审慎地处理有关批评和文化理论自身的有关文本。

为了能够达到这一目的,文化批评需要一套能够用以完成这一工作的工具,而这正是本书极力建议要做的事情。如果没有经过认真思考而建立起来的参考框架,文化批评就不能指望对它所批判的文化所内涵的价值进行任何严肃的干预。

在今日文化研究理论层出不穷,甚至有爆炸之势的状况下,本书采取了一种可以称之为“**后结构主义的(poststructuralist)**”路径,意欲证明,应当把文化看做是意义系统的结果,而不是一些不证自明的真理,因而,本书主要关注的是作为表达过程的意义、差异和移位。本书所探讨的问题也是伴随这一立场而来、受其检验以及与之对立的诸多问题。不可避

免地,在本书的每一章,都用这样的术语界定了作者的态度。尽管在本研究展开的过程中,涉及了大量的思维方式,但这并不单纯是为了客观地呈现今日文化批评学者可以接触到的资料。每一章都阐释了所探讨内容的范围,并明确地给出了作者的态度。在这一框架之内,这些态度从不是一个个人趣味的问题,而是追根溯源,依据后结构主义思想的重要观念而具体地提出来的。除此之外,本书还对今日批评和文化理论中的重要问题进行了勾勒,其目的是根据其呈现出的可能性,明确并辨析有关批评和文化理论的知识体系。7

因而,本书被分为6章,可以分开来阅读其中任何一章。但与此同时,依次阅读本书各章,会产生一种引人入胜的效果,使你不仅对分别探讨的问题产生兴趣,而且会禁不住想,本书所探讨的问题构成了一个更大的共鸣场,因而,把各章割裂开来阅读成为不可能的了。

第1章“文本性与意义表达”,详尽地探讨了“文本”或“文本性”和突出了表意过程在文化批评中地位的文化实践等问题。这包括关于两者之不同理论的描述,也包括这样一种论点,即这样一种方法能够为随后的文化批评实践提供多种可能性。第2章“美学”,继续探讨文本和意义表达的问题,着重探讨了两者构成表意效果的方式。这就要求,不但要探讨美学理论,还要探讨这种谈论所使用的术语可能存在的危险,弄清楚是否会影响批评看待文化文本以及文化与文本关系的方式。这使得文化批评政治学这一问题逐渐凸显出来。第3章“伦理学”,相当重视这个政治学问题,并着重探讨了伦理学的诸多理论,思考“文化批评伦理学”是否可能成立。在此过程中,该章还意欲弄明白,把行为、批判或文化实践看做具有内在的伦理性与否,以及相应的思维方式,是否存在危险。在第4章“他者性”之中,探讨继续进行,着重探讨了“他者”问题、自我与他者相互的构成性关系问题,而这些是思考各种“他者性”问题所必然涉及的问题。第5章“真实”,则带领我们进入了饱受质疑的关于“真实”的概念性空间的领域,而伦理学可能以此为基础,也可能不以此为基础。从把“真实”看做虚空的种种理论,到把“真实”看做类似“感知”的理论,再到把“真实”看做永远不可能在意义领域之内得到理解的看法,其中可能存在的危险,都得到了检讨。最后,即第6章“非人性”,

探讨的问题在所有其他问题当中都能够找到其踪迹,而又保持了某种距离,这是因为,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以人为喻,浓缩了之前所有讨论越发突出的重要性。在本书分析的结尾,人是否还存在,正如本章将要探索的那样,尚难遽下定论。

- 8 在本书探讨的过程中所详细阐述的一些观点,不可避免地是难以理解的,特别是首次遇到的时候。尽管严格地说,本书并不是一本入门的著作——它要求读者至少熟悉所探讨的某些主张——但特别难懂或容易引起争议的术语在本书首次出现的时候,将使用黑体字,并在本书最后面的“术语汇编”中被界定。另外,对于那些想跨越这本薄册而进一步探索的读者,本书还特意开列了一份详尽的参考书目。
- 9

第 1 章 文本性与意义表达

为什么要谈文本性与意义表达？

由于这里所提倡的批评实践是一种突出意义表达过程的实践，因而就有必要首先从深入细致地探讨影响这一实践的诸概念入手。因此，本章在一开始的时候，对批评思维中出现的“文本性”和“意义表达”等概念的演变进行了追溯，目的是展示其对于“文化批评是什么”和“文化批评能够做些什么”等讨论的贡献。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重温一些已经为人所熟知的原则。然而，由于此处所展开的讨论依赖于对这些原则的准确理解，所以，从一开始就对这些原则所涉及的诸种因素及其原因有一个清楚的界定，也是同样恰当的。有鉴于此，本章接着探讨“文本性”与“意义表达”等概念影响特定的文化批评实践的方式，并进而检讨把文化看做是文本结果所可能引发的问题。

从作品到文本

在一篇首次用法语写成、出版于 1971 年的文章，“De l'oeuvre au texte”中，结构主义批评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首次奠定了关于批评思维转向的若干初步性基础，而这一转向在法国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该文被斯蒂芬·希斯（Stephen Heath）于 1977 年译成英文，题目为“From Work to Text（从作品到文本）”。这些基础值得仔细探讨，因为它们揭示了对于作品和文本的理解中出现的问题是什么，以

- 10 及为什么要提倡从作品到文本的转向。尽管对该文题目的翻译浓缩了巴特原文的构思轨迹——即思维从作品到文本的转向——但前一题目由于强调文本所体现的作用,蕴涵着更多关于巴特的思想体系的内容。这两者都有重要的影响。

在巴特看来,作品这个概念对于文化批评规划是没有帮助的,因为它既排除了文化研究的创造性的可能性,也排除了文化研究所潜在具有的能力,即承认文化研究的对象可以发生作用的方式所具有的政治意义。在他看来,作品这一概念至少具有两个严重的缺陷——关系和消费。巴特把版权法看做是所探讨的这一概念的法律体现,并指出,作品这一概念在文化中所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所研究的对象因此而变得僵硬起来。也即是说,只有依据它作为制造其作者的“财产”这一地位才能对它进行解释,因而,也只能依据原作者的想象对它进行判断。如此一来,作品这一概念就被签上了巴特所称的“始作俑者”的名字。依据通常对待作品的方式,简·奥斯丁(Jane Austen)的作品《爱玛》(*Emma*),只有用作者奥斯丁的术语,包括她的情感方式和她在某些特定的书面表达方面上的才能,等等,才是可以理解的。在作品这一概念所标志的术语之限度内,作者有可能无处安身,但是,作品也取决于它与被用来解释它本身的事物的关系。例如,从概念的角度上看,历史与作者可能同样行得通。我们因此可以说,简·奥斯丁创作《爱玛》的时代使得《爱玛》成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样子,取决于当时适用的妇女地位、婚姻和财产法等等。无论我们以什么方式看待它,依据这些术语而界定的作品这一概念,都决定着研究对象的性质以及对于它的认识,把它置入与“某物”的一种关系之中,而该物又可以用来对它进行解释。换言之,它符合于(**conforms to**)理解它所依据的事物,而就这一符合状况来说,它以及对它进行的任何解释,都是完整的。

作品的这一完整性带来了巴特所认定的第二个概念问题,即把作品当做消费对象的问题。我们要消费某物时,就把它吃掉。也就是说,我们选取某种完全成型的、完整的東西——比如苹果,通过使其成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而摄取它,为的是获得一种满足感、健康,甚至是消除我们所说的饥饿感。但是,这果真就是一件作品,一件文化物品的全部吗?